

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

汪受宽 屈直敏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通过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史和少数民族史学及史学史的研究现状, 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和少数民族史学的辉煌成就而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极其薄弱的历史与现状, 探讨加强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的重大意义, 并就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史学史;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7)01-0047-11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 史学史意识和观念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西汉司马迁论《春秋》^[1]卷14, 509-511, 东汉班彪《续太史公书》作后传数十篇, 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2]卷40, 1324-1327, 是中国早期史学史意识的渊藪。南朝齐梁之际则出现了有关史学史的专论, 如刘勰著《文心雕龙》(成书于501年左右)辟《史传》专篇, 从纵横两方面对前代史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论。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成书于710年), 则是一部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专著。此后, 宋代郑樵著《校讎略》、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等, 都是建立在史学意识和理论分析基础之上的史学史专著, 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史学史观念发展的清晰轨迹,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就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来说, 有著述, 却不发达, 亦不明晰。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 其研究及学科的建立则是近代西方史学史观念传入之后的事。

西方史学也有极其辉煌的传统, 但西方史学史出现的时间却比较晚。在西欧, 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 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和威格尔(F. Wegele), 如威格尔的《人文主义以来的德国史学史》(1885)等史学史专著^[3]译序, 6-7。至20世纪初叶, 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史学史专著, 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Ed. Fueter)的《近代史学史》(1911)、英国历

史学家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 Croce)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1915)、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M. Ritter)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等。20世纪中叶, 源起于德国的“新史学”被鲁滨孙引介到美国并广为传布, 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也因此盛极一时, 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先后出版了班兹(又译作巴恩斯, H. E. Barnes)的《历史著作史》(1937)、绍特威尔(J. T. Shotwell)的《史学史》(该书原名《史学史导论》, 1922年出版, 1939年著者修订原书, 改称《史学史》第1卷)、汤普森(J. W. Thompson)的《历史著作史》(1942)等三部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史著作^[4]译者前言, 2。由于解放前我国有些大学里用鲁滨孙及其学生们的许多著作的原本或译本作课本, 所以“新史学”理论得以传布全国, 对我国的史学界的影响极其重大^[4]4-5。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中国学人开始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构^[5]。

一、8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20世纪初, 在中国追寻建立新史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 其先驱者当属梁启超无疑。虽然胡适在1924年发表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已经使用了“中国史学史”这一名称, 但其所指为中国史学的历史, 而非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6]70。作为近代具有学科范畴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及其研究, 则是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1922年

收稿日期: 2006-12-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05JJD770109)资助。

作者简介: 汪受宽(1943-), 男, 江苏东台人,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从事中国史学史、文化史及西北地方史研究。

至1937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历史统计学》、《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等。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不仅明确提出了“史学史”这一概念,而且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对象、内容及范畴作了概要论述,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7]。所以中国史学史研究,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开辟“史学史的做法”章节算起,已经历了80余年。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人物李大钊,从1919年至1920年之间,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主要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历史哲学》、《史观》,以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代表著作,并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李大钊还在1923年发表了《研究历史的任务》,1924年和1926年两次出版了《史学要论》,对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目的、方法、作用和意义等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阐释。李大钊的这些理论建树和学术活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启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下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序幕^[8]。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史学史的研究也备受史学界的关注,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有的研究者写出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甚至公开出版了中国史学史专著,如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暨南大学印行,1933)、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铅印本,1938)、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铅印本)、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论》(史学书局,194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公司,1947)、何炳松《中国史学史》(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等^[9]62-67十几种史学史讲义和著作问世,表明了史学界对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自觉要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该书材料丰富,条理分明,构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

行世60余年,一直是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这些著作,一般都重视史部目录学和历史要籍介绍,且对于史官、史家的论述较多,从中不难看到受梁启超有关论点影响的痕迹。

1949年10月以后,史学工作者致力于社会发展史、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学习,逐渐产生了用新的历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进行科学分析的愿望。1961年初,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历史系科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史学史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学术界展开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一些高校对传统史学研究很深的学者陆续开设起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史学史专著与论文的撰述也陆续开展。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旧作的基础上,略事修订、删削,于1957年在商务印书馆再版。刘节撰成《中国史科学与史学史》,1978年由曾庆鉴等整理成《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白寿彝《中国古代史学史教本(上)》(北京师范大学排印本,1963)等,同时发表了许多单篇研究论文。然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断了十年。其间,台湾地区出版有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近30年,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繁荣的时期。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专著主要有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6)、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施丁《中国史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周春元《中国史学史》(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1989)、邹贤俊《中国古代史学史纲》(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等。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专著主要有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高国抗、杨燕起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96) 等。贯通古今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主要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施丁《中国史学史纲要》(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 1997)、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199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等^[10]。有关史学思想、思潮与流派的研究专著主要有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 1994)、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陈其泰《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苑出版社, 1999)、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 关于中国史学史断代与专题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 诸如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 1992)、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5)、许兆昌《周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论文, 1995)、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汤勤福《朱熹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 2000)、任冠文《李贽史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彭忠德《秦前史学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中华书局, 2005) 等。台湾地区出版的史学史著作有席静涵《周代史官研究》、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逯耀东《魏晋南北朝史学》、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杜维运《清代史家与史学》等。在史家、史著、史学史资料方面编辑出版的著述主要有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陈清泉、苏双碧等《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中州古籍

出版社, 1985)、瞿林东、杨牧之《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中华书局, 1988)、李侃《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传·史学家系列》(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杨翼骥《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1987)、第二册(1994)、第三册(1996)(南开大学出版社) 等, 以及大量关于《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史通》、《文史通义》及古代著名史家、史书的研究论著^[11]。这些著作, 以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为指导, 重点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阐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性质和任务, 总结中国史学史的规律。

20世纪是中国史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自30年代至今,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历经活跃与寂寥, 在史官、史家、史著及修史制度、断代史学史和史学通史、史学流派、史学思想以及中国史学史的起源、分期、特点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由于这一时期的史学界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多领域、多层面的深入研讨, 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 与其它史学门类相比, 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研究的基础至今还不够雄厚。从总体上看, 论著多为个人或少数人合作的产品, 未能聚集全国史学史研究的力量, 撰写出版大型多卷本中国史学史, 以及各种系列的断代和专门的史学史; 从时域上看, 古代研究的多, 明清的却不够充分, 特别是20世纪新史学的研究兴起之后, 近现代的史学史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但相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而言, 对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仍相当薄弱; 从地域上看, 汉族和中原皇朝的多, 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不多; 从具体对象看, 名著名家研究的多, 一般著述和史家研究得不够等, 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造成这些缺憾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有问题, 也与史学史界至今尚未建立全国性的学术组织有关。今后应在这些方面加以注意, 全国同行也应共同努力, 分工协作, 填补史学史研究的各项空白, 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更大成绩。

白寿彝先生曾指出: “就中国史学史讲, 现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还逗留在汉族史学史研究阶段。”所以他提出, “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12]414}。虽然作为全国范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蓬勃展开, 但就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而言, 距白寿彝先生提出的建立“全民族的史学史”这一目标却相去甚远。2005年5月13日, 中央民

族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在西山中央民族干部学院联合召开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罗贤佑研究员在会上做专题报告时呼吁,目前民族史研究的迫切任务是修撰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以总结学科的发展,并对未来研究加以指导^[13]。由此可见,进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编撰系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专著,努力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是当前中国学界同仁的共同愿望,也是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

目前,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先生的倡导下,由兰州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所长汪受宽教授负责,联合了甘肃、云南、内蒙、东北、广西、新疆、海南等地的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专家,正积极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各项研究工作,计划用3年以上的时间,初步撰成一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为建立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做贡献。

二、少数民族史学及史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以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为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14],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20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成就显著,为我们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做了一定的准备。

20世纪的民族史学研究缘起于新史学思潮下的近代民族史观。清朝末年,黎庶昌、孙中山、黄兴等人提出“民族平等”口号,倡导“五族一家”。特别是孙中山所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含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5]²,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民族观。然而较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先驱则是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1901年9月第90~91册)上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3~58号,1902年3月至1904年12月)、1905年在《新民丛报》(第65~66号,3~4月)上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22年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作为讲演的记录稿发表于中国地学会出版的《地学杂志》1922年第1~7期,此讲演的记录稿又以《中华民族之成分》为题发表于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史地丛刊》1923年第2卷

第2、3期合刊,其内容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基本相同。)等系列论文,阐发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源流、系属和分布^[16]。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于1907年在《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中,也使用了相同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并且还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特点,以及他自己对于民族识别和认同的理解^[17]。1900年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一文中,论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史,1907年章太炎在《民报》(7月15日,第15期)发表《中华民国解》也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8]。

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第1卷第12号)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首倡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19]。1928年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设立民族学组,并亲自主持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进行综合或专题调查,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其他学者也先后编撰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专著,为中国近代民族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同时,燕京、清华、云南、四川等大学也分别进行了一些民族史研究工作。1934年3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同年冬,中国民族学会成立,推动了民族史地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其间,相继出版了张其昀《中国民族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订正增补本,1934)、常乃惠《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曹松叶《中华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33)、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5)、柳贻徵《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成都,1936)、李广平《中华民族发展史》(正义出版社,1941)、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俞剑华《中华民族史》(国民出版社,1944)、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光华出版社,1948)等十多种。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对西南和西北各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书刊,使国内民族研究粗具规模,形成了前期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兴盛局面^[20]。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学研究,主要是运用西方传入的民族概念和人类学

理论, 扒梳整理古籍文献中的民族史料, 分别对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史的分期、民族的起源、名称以及与他族的关系、历史沿革及现状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初步建构了中国民族史学的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 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为理论指导的民族史学, 在科学院系统、民族学院及有关院校、政府部门逐步建立了民族研究机构, 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 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获得了逾千万字的调查资料, 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下, 于1958至1963年间完成了《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少数民族简志丛书》、《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等3套丛书的编印。各个民族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极为显著,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58年成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两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 民族研究所归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年10月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建所40多年来, 完成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 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部分著作, 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等专著500余种, 译著100余种, 资料集、论文集300余种, 工具书100余种, 公开发表论文3000余篇^[21]。1986年成立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短短的20年中, 先后编撰出版了多杰才旦等合著《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刘洪记、孙雨志合编《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李鹏年《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坐床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档案选编》、《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等4部档案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等诸多代表性著作^[22]。全国各地及院校系统的民族研究机构的论著更是不可胜数, 在此不一一列举。

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以后, 民族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自20世纪80年代起, 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迅速发展, 成果累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专著有翁独健《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唐嘉弘《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黄崇岳《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人民出版社, 1988)、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9)、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 1990)、文史知识编辑部《中国古代民族志》(中华书局, 1993)、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版社, 2001)等。台湾地区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著述, 主要有罗香林《中国民族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 1953)、刘义棠《中国边疆民族史》(台湾中华书局, 1969)、杨学琛《中国民族史》(台北天津出版社, 1994)等^[23], 同时,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和组织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5套丛书, 总计数百册。这些先后出版的研究成果, 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 阐述了各个民族起源、形成以及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4]。林幹、冯家昇、耿世民、周伟洲、王尧、陈践、杨富学、陈燮章、汤开建、刘建丽、韩荫晟、和万宝、和家修、包文汉、乔吉、魏治臻、方国瑜、施联朱、吕大吉等学者, 对匈奴、突厥、回纥、维吾尔、吐谷浑、吐蕃、藏族、党项、纳西、蒙古、彝族、傣族、畲族等民族及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文献进行汇集、整理或研究, 形成了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高潮, 同时也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25]。纵观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研究, 不但在学术上有新的探索和开拓, 而且也是以民族平等思想原则研究民族历史的具体范例。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 都成就空前, 显示了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厚基础和丰硕成果^[26]。

在民族史学理论方面, 特别是少数民族史学理论及方法的研究方面获得了空前发展。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89)和《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先后出版, 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论, 全面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开展。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1卷

《导论》第1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和《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民族宗教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等著作中, 高屋建瓴地概述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史的撰述传统, 提出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历史疆域理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 揭示出民族关系的本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缔造中华文明, 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 1994)一书提出“民族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和中华民族整体研究架构”, 推动了民族史学研究向综合和纵深发展。饶宗颐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一书对古代史学中的“正统”思想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辨, 丰富了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内含。瞿林东《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一书以及陈其泰《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一文则对“民族史学与民族凝聚力”这一理论进行了阐释。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0)一书对民族学的理论、内容以及当代民族学研究的任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民族学与我国现代化”的辩证关系。陈育宁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一书主要从理论高度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王建民等合著《中国民族学史》(上、下,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1998)一书主要对20世纪前半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学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探讨, 对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特点问题等发表了颇为独到和不乏精辟的论述。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上、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一书主要对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实地研究与历史进行了探讨和探索, 提出了用“纵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民族的独到见解。宋蜀华《中国民族学五十年: 1949~1999》(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一书对新中国民族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并对其学术活动及其成果进行了分析, 将中国民族学的历史和现状放到国际学术界的大背景中进行回顾, 重申民族学中国化的重要性, 强调系统地建构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带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论, 强调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应将历史文献和现

状调查相结合, 以及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此外, 陈琳国《伟大的步履——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凝聚力》(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木芹《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民族出版社, 1995)、马戎、周星《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卢勋等合著《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民族出版社, 2000)、陈育宁《民族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林甘泉《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等, 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有关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形成过程及形成诸因素等问题, 既有翔实的史料根据, 又有深刻的理论分析, 见解独到, 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是我国史学界对中华民族史学研究的可喜收获, 这说明, 民族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在不断朝着明确、具体的方向发展。

相对于兴旺发达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而言, 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则显得较为滞后。虽然历史上也有关于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 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仅是一些零散的、片断的研究和撰述, 更谈不上形成专门学科^[27]。新中国成立以后, 随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亦有所开展。

论及少数民族史学史的专著主要有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叙篇》(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中指出: “就中国史学史来说, ……国内的兄弟民族, 如蒙古、维吾尔、藏族、傣族、白族等, 也都有他们的史学, 现在我们知道得还很少。把中国史学史写成一部多民族的中国史学史,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并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9年, 施丁先生在总结新中国40年史学史研究成果时指出: “对中国古今之史学, 如不通, 则称不得中国史学史。对中国各阶段之中各族之史学, 如不通, 则也称不得中国史学史。故我们对古代史学史要研究, 对近代、当代的史学史也要研究; 对汉族的史学史要研究, 对蒙、藏、回等各族的史学史也要研究”^[28]。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1999)一书着重论述了“辽金史学的民族特色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 并以数万字的篇幅阐述了“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

史学”, 开史学史著述新面。对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综述和专题论述论文主要有陈连开《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形势与发展前景的蠡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从中国民族史学的成就与潜力、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中国民族史学要进一步适应新的形势, 争取新的发展等方面, 讨论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现状和未来的良好前景; 史金波《把中国民族史学研究引向深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2期)一文从中国民族史学的蓬勃发展、中国民族史学的社会功能、深入开展民族史学研究等方面, 论述了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现状、功用和未来; 李珍《近五十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主要从民族史学研究的源流、成果分析和理论探讨, 对新中国50年来的民族史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其他相关研究有史式《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历史教学》1996年第6期)、雷虹霁《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 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4期)等, 主要对民族史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述; 专论某一个民族史学的论文有王尧《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王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3期)等, 分别对藏族历史上主要史籍的基本情况、藏族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等问题作了概括性论述; 向中银《试论彝族的重史传统》(《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4期)、《中国彝族古代史官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等, 对彝族史学的制度、传统作了初步探索; 吴怀祺《金世宗时期的史学和大定之治》(《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金北人《完颜勛与金代女真史学》(《蒲峪学刊》1992年第1期)等主要对辽金时期的史学成就进行了论述。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 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 对民族史学中的具体问题研究较多, 理论问题研究较少; 微观问题研究多, 宏观问题研究较少; 对个别问题研究多, 综合性的规律认识少; 多侧重于民族史学研究现状的论述和对未来的展望, 或则重于民族史家、史著以及断代民族史学的专题研究, 缺乏对某一少数民族的史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 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研究, 有关

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也十分薄弱。这表明,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

三、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意义

1991年2月江泽民同志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时指出: “社会科学的方向正确与否, 社会发展状况如何, 对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 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1. 促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拥有多民族的历史和史学, 中国史学史应该对此有较为全面的反映。白寿彝先生论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时, 曾提出应该撰写“全民族的史学史”。他在1985年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期间指出: “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 内蒙、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 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 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 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 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12]414}将少数民族史学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这说明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 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就是一部多民族交融、共创的历史, 没有少数民族的历史, 中国历史是不完整的。同样, 缺失少数民族史学史的中国史学史, 也是不完整的中国史学史。因此, 加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 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置于中国史学史的总体发展过程中加以系统考察, 写出完备的中国史学史, 不仅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民族史研究而言,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白先生的倡导下, 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 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现在还处在起步的阶段, 需要广大的史学研究者进一步付出艰辛的努力。

2. 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学成果, 留下了珍贵的史学遗产, 它们是各少数民族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共同创造中

华历史的记录。要深入研究这些文化遗产,需要兼通有关的学科,而多学科知识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补充,是民族史学研究发展的关键,同时也需要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掌握历史学的资料和方法,才能优势互补,触类旁通,有所创获。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以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和史学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少数民族史学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为研究目标。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史学进行具体的研究,通过系列的个案研究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史学成就;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史学进行综合研究和宏观的把握,揭示各民族对中华历史及中国史学史的贡献,这不仅可以为更全面地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也可以推动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3. 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其复杂和亲密的血缘交叉,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就有着密切往来、共同发展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在近现代,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抵御外侮,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实现独立自由、富强民主而一起流血流汗,更加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凝聚力。新中国建立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建立起了新型的民族关系,使各民族的社会地位、经济文化与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建设的浪潮中,只有各民族互相交流和支援,团结稳定,共同繁荣,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创中华未来的伟大理想,才能使中华民族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发挥中国民族史学的社会功能,使全国各族人民深刻地理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加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是当前民族史学研究非常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史学史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史学史。在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框架中系统考察各少数民族史学,不仅能够促进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而且有助于人们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通过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从史学发展的层面上,探求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过程的特点,揭示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各少数民族功不可没,成绩巨大,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证实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真理。同时,通过

对少数民族史学的系统研究,还可以揭示少数民族史学的丰富内涵和优良传统、汉族史学与少数民族史学以及各少数民族史学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与借鉴,从史学和文化的发展方面,证明各个民族共创中华历史,有助于建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这对于进一步总结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和推进史学的发展,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4. 构建全民族的史学史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于各民族而言,了解本民族的族源、发展,与其他民族血族亲情的密切关系,以及对祖国大家庭、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是人们增加文化营养,树立民族自尊心,培育健康民族心理素质的一种正当要求。在当前改革开放、各民族交流频繁、共同繁荣、共建和谐社会的时期,尽量多地增加民族历史知识,对提高民族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通过对少数民族史学的全面系统研究,揭示各个民族璀璨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特点,构建一部全民族的中国史学史,必将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知识,提高各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为增进民族素质,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弘扬爱国主义做出重要贡献。另外,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除了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外,还必须有历史的依据,因而,熟悉掌握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民族政策方面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

四、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设想

在史学研究中,对各兄弟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已由个别的、零散的研究发展为有组织的、全面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民族观为指导的科学研究,由猎奇式的或个别领域的孤立研究,转变为对各民族起源、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发展中所作贡献的系统研究,由偏重各民族有影响的首领人物及其家系的研究转变为对各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的研究,从而为我们进行全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仅就我们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任务、理论、方法、史料、内容等提出一些基本设想。

1.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任务。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主要以少数民族史学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少数民族史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与贡

献为研究目标。通过研究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史官、史家与史学成就, 综合研究和宏观把握少数民族史学的史学思想、历史观念及其与他学科及社会的关系, 探索少数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优良传统, 各民族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等, 从不同的层次对少数民族史学遗产进行发掘与总结, 揭示各民族对中华历史及中国史学史的贡献, 展示中国史学史多元一统的历史面貌与特点, 进而推动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2. 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我国少数民族史学家在其长期的史学实践中, 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有其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传统。建国以来, 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和社会主义民族观为指导, 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与西方国家民族史学研究根本区别之所在。近几十年来, 西方各国的民族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有新的成就。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要重视采用我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传统理论, 还要吸收西方民族史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并且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突破旧史学理论的局限, 站在新世纪民族学和史学史的新高度,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史学史理论思想体系。以其为指导, 进行我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具体研究。

3. 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 是历史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文献学方法和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少数民族的历史观念、历史编纂、民族史家与史著、民族史学批评进行分析总结, 揭示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与特点, 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建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基本框架, 使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史学形成比较, 从而建立起中华各民族的比较史学。更充分地探讨民族史学的性质、史学的起源、史学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史学史的理论体系, 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走向理论化、科学化作出应有贡献。

4. 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资料。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资料, 应尽可能包括: 少数民族口传史、民歌、说唱, 少数民族的史诗、史书、史论、碑铭、谱牒, 地方和少数民族典志、档案、文书、契约、文物, 汉文及其它文字(如西文、日文等)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调查、问询, 少数民族史学家对本民族的史学或中华各地各时代史学的记载和研究成果等。还要进行一定的社会调查, 充分吸收利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5. 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包括: 该民族历史概述。民族口传史学、史诗; 民族文字的历史著述, 非该民族文字的该族历史著述; 各民族史学的萌芽产生, 民族史学的奠定、发展、演进、现状; 各民族史学产生发展演进动因和机制; 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 巫史、宗教、风俗、文化、文字、教育、科技、政治体制等与民族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 各民族史料保存和史书编撰机构的建立、运行、成果与特点; 各民族史学要著的专题研究, 包括作者(本民族或非本民族)、成书、体例、内容、特点、地位、评价等; 各民族史学家研究, 包括其出身、生平事迹、思想、著作(撰写的本民族史书, 中原或全国性史书, 世界史史书, 史学理论著述等)特点、评价等。各民族史学组织或流派研究; 各民族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及史学批评研究; 各民族史学与汉族史学(或其它民族)的关系与相互影响研究。要将各少数民族的史学放到整个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 揭示少数民族史学的特点, 同时探索少数民族史学对中国史学史的深刻影响。更要注重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组组下,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大发展与大进步。

6. 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基本结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课题, 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研究任务, 必须捕捉重点、分民族、分时段和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因此, 必须选择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兼及其它少数民族, 既要充分利用汉文典籍中所反映的少数民族史学, 更要深入发掘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典籍, 还要研究少数民族史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 以及少数民族史学与传统汉族史学的相互影响与促进。

例如, 为了便于更好地揭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历史, 前面提及的研究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就拟将整个研究分为四部分, 即“导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导论不仅要勾画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还要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批评以及基本特点, 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说明研究范围、体例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以内蒙古和东北为中心, 要勾勒北方少数民族史学产生与发展的概况, 总结其特点。主要以匈奴、鲜卑、靺鞨、契丹、女真、蒙古、满、朝鲜等族的史学发展及其特点为重点,

兼及其它少数民族,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的史学发展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以桂、黔、滇、川、藏为中心,在勾勒南方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概况,总结其特点以后,重点研究蛮夷、百越、吐蕃、乌蛮白蛮、藏、苗、彝、壮、傣、白、台湾蕃夷高山等族的史学发展及其特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的史学发展史。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以甘、宁、青、新为中心,重点研究氏、羌、戎狄、吐谷浑、突厥、回鹘、党项、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族的史学发展及其特点,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史。通过这四部分的研究,构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总体框架。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从纵的(各个时期)和横的(各个民族)方面,全面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涵盖了我国境内古今各少数民族的史学成就,这种综合性的研究,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难度很大。研究这样一个涉及范围广、时间长、理论性强的课题,我们要从党的民族政策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为指导,要有开阔的眼界,从时空两方面宏观把握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与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共性与个性。我们坚信,从实际出发,立足创新,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必将产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后汉书·班彪传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英)古奇.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 耿淡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4] (美)汤普森. 历史著作史[M].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5]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1986. 侯云灏.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J]. 历史学, 2002(12): 22-25. 侯云灏.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5): 32-36. 史革新.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 60-65.
- [6] 胡适. 胡适文存二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6.
- [7]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 [8] 李大钊. 李大钊史学论集[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 [9] 朱仲玉. 中国史学史书目[J]. 史学史研究, 1981(2).
- [10] 朱仲玉. 中国史学史书录续篇[J]. 史学史研究, 1997(4): 21-28. 牛润珍.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1(8): 11-15.
- [11] 白寿彝. 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C]//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1999: 328-339. 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 20世纪的发展道路[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2): 39-49. 瞿林东. 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J]. 史学月刊, 2003(10): 5-25. 张子侠.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4): 107-112.
- [12] 白寿彝. 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C]//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论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13] 肖春娟. 历史系与中国社科院有关单位合办专题学术研讨会[J]. 中央民族大学周报, 总1121.
- [14] 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 诸多学者常用“民族史学”这一范畴, 而较少使用“民族史学史”这一范畴。对于这两个范畴, 大多数学者是将两者等同视之, 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史学研究, 指的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学, 包括少数民族史学及汉族史家的民族史撰述两个部分, 其研究任务是探讨民族史学发展的过程、成就与规律”, 参李珍. 近五十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1): 129; 但有的学者却认为“中国民族史学是研究中国古今各民族历史的学科”, 参杜荣坤, 华祖根. 中国民族史[C]//肖黎, 主编.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460; “民族史学是以某一民族为对象, 对其起源、形成、发展、兴衰或消失规律、风俗习惯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等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参雷虹霁. 中国民族史学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新思考: 20世纪的学术回顾与理论反思[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2(4): 72.
- [15] 孙文.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M]//孙中山全集,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6]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文集》第1册之6、7, 《专集》第3册之41、42.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7] 刘晴波, 编. 杨度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18]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4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19] 中国学术经典·蔡元培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20] 田亮. 抗战时期史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李珍. 试论五四时期的民族史研究[J]. 东岳论丛, 1999 (3): 21-23.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概况[EB/OL]. <http://iea.cass.cn/intro.asp>.
- [22]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课题与成果[EB/OL]. <http://www.tibetology.ac.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64> (中国藏学网), 2005-4-14.
- [23] 罗贤佑. 中国民族史研究20年[J]. 民族研究, 1998 (5): 59-68.
- [24]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辑出版情况述略[J]. 史学史研究, 1982 (2): 71-72.
- [25] 杜荣坤, 华祖根. 新中国民族史学的回顾与展望[J]. 民族研究, 1984 (6): 1-10.
- [26] 蔡美彪. 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近况与前景[J]. 西北民族研究, 1986 (3): 8-13; 史式. 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史的研究[J]. 历史教学, 1999 (6): 51-54; 方素梅. 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J]. 民族研究, 2005 (2): 95-105.
- [27] 李珍. 近五十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1): 129-136.
- [28] 施丁. 中国史学史[C]//肖黎, 主编.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600.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thnic Histological Discipline

WANG Shou-kuan QU Zhi-min

(School of Histor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logical studies both in general and in ethnic research,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that exist in the discipline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n ethnic histological discipline.

Keywords: ethnic groups; histology; status of research

(责任编辑: 寇 甲)